

孔
德
騏

六

韋

綫

說

解
放
軍
出
版
社

六韬浅说

孔德骐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7.25印张 160千字

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—31,000册

统一书号: 5185·127 定价: (平装) 1.25元
(压膜) 1.45元

目 录

《六韬浅说》序.....	吴如嵩
一、《六韬》的作者、成书时代和版本问题.....	1
(一)《六韬》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考.....	1
(二)《六韬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的作品.....	6
(三)《六韬》及《六韬逸文》的版本.....	11
二、《六韬》的军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.....	15
(一)《六韬》释义及其主要内容.....	15
(二)《六韬》在军事上的成就.....	17
(三)《六韬》对后世的影响.....	29
三、《六韬》六卷原文、译文及浅说.....	35
卷第一 《文韬》.....	35
卷第二 《武韬》.....	70
卷第三 《龙韬》.....	91
卷第四 《虎韬》.....	129
卷第五 《豹韬》.....	160
卷第六 《犬韬》.....	181
四、附录：《六韬逸文》(清)孙同元辑.....	205

一、《六韬》的作者、成书 时代和版本问题

(一)《六韬》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考

《六韬》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，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《六韬》旧本题作周吕望撰。该书最早见诸著录的是《隋书·经籍志·兵家》，内有《太公六韬》五卷，谓“周文王师姜望撰”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·兵家》和《唐书·艺文志·兵家》均著有《太公六韬》六卷，以后各代因之。

吕望，姜姓，名望，字子牙。其祖先被封于吕（古国名。传为四岳之后。在今河南南阳西。春秋初年为楚所灭），所以又称吕尚。周初为姜姓部族长。武王伐纣时，吕望率师出征，被尊称为师尚父，在牧野（今河南淇县西南）之战中卓立战功。成王时被封于齐，建都营丘（今山东淄博东），授以征讨五侯九伯的特权，地位在各封国之上，因而又有太公之称。

从吕望所处的时代和《六韬》的内容来判断，这部兵书的作者显然不可能是吕望。首先，商末周初的战争实践，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没有形成系统的、完整的军事体系。其次，当时的文字条件还不完备，即使有所记述，

也难以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。古代虽有所谓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的说法，但从未发现《六韬》这样的长篇文献，何况是镌刻于青铜器上。所谓“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（《左传·鲁昭公十二年》），都是指文化典籍。“墳”、“丘”又义为高阜、大丘，有保存这些文献地点的意思。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每年都有水患，稍不慎就会被水毁掉。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千秋”，就是古代收藏文化典籍的一种方法。因此，从镌刻和保管方面看都是很困难的。春秋期间，孔子整理历史文献时曾感慨地说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
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这说明商周文献保存下来的很少。第三，从叙述方式看，也不象吕望一人之作。以问答形式探讨问题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。按照一般说法，《论语》是孔子的著述，《孟子》是孟轲的著述，《管子》是管仲的著述，《吴子》是吴起的著述，而这些书的篇首都冠以“某子曰”，因此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弟子当时的记录，或后人整理辑成的。从体例上看，《六韬》也属于这一类。第四，《六韬》的不少内容，不是当时而是后世才出现的。如“凡国有难，君避正殿”（《龙韬·主将》），“战骑”（《犬韬·战骑》），以及《虎韬·军用》中所提到的“铁蒺藜”、“铁铤锁”、“环利铁索”、“铁杙”等器械，在殷末周初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根据以上分析，《六韬》不会是殷末周初的吕望所撰，很可能是后世托吕望之名编撰的，而编撰者的真实姓名却无从查考了。

自宋代以来，许多辨伪学家对《六韬》的作者和编撰年代，进行了长期而认真的探讨，基本认定《六韬》是后

人所伪托。宋代的叶适说：“……然周嫚侮为方术者，而不悟《六韬》之为伪，何也？盖当时学术无统，诸子或妄相诋訾，或偶相崇，出于率尔，岂足据哉。”（《习学记言》）南宋藏书家陈振孙说：“武王、太公问答，其辞鄙俚，世俗依托也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）南宋黄震说：“《韬》、《略》，世谓出太公，虽李卫公亦云。以愚观之，伪书尔。”（《黄氏日抄》）明代胡应麟说：“《六韬》称太公，厥伪了然。”（《四部正讹》）清代姚际恒说：“其辞俚鄙，伪托何疑。”（《古今伪书考》）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说：“今考其文，大抵辞意浅近，不类古书。中间如‘避正殿’乃战国以后之事，‘将军’二字始见《左传》，周初亦无此名，其依托之迹，灼然可验。”黄云眉在《古今伪书考补正》中指出：“惟一端极可笑者，胡元瑞说，《六韬》有《太公阴符》篇，云：‘主与将有阴符，凡八等；克敌之符长一尺，破军之符长九寸，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’，盖伪撰之人不识阴符之意，以为符节之符也。”

那么，《六韬》的作者究竟是谁？他是什么年代的人？根据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，《六韬》一书很可能是战国后期由某人托姜望之名撰写成的。这是因为，周朝发展到春秋战国时，铁器的使用，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。人们不再把字刻到龟甲或竹木简上，而是用硬度较大的铁制的“刀笔”书写在简牍上。由于大量书籍的出现，曾有一种官职叫“刀笔”。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说：“臣少为秦刀笔，以官长而守小官。”这应该算是出现了镌刻《六韬》这样长篇著作的客观物质条件。第二，战国是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的时代，频繁战争需要人们继承和整理古代一切有关战争的经验和文献。周初有一千二百多个封国，到春

秋末期只剩下晋、鲁、燕、齐、中山等十余国，战国时已是七强并立的局面。过去的战争虽然接连不断，但战国时的争霸和兼并战争，在战争的规模、地域方面都比过去大而广了，延续的时间也长了。各国都在尽一切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它们除采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的其他措施之外，无不注重以历史上的军事学术和作战经验为鉴。第三，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化，学术界形成了许多流派，各派互相辩争，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在诸侯割据纷争的形势下，知识分子们走“公室”（春秋战国时诸侯的家族，亦指诸侯国的政权），跑“私门”（犹“家门”，指权臣的家宅），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，而各诸侯国的国君和大贵族，也企图招揽大批知识分子到自己身边，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效力。所谓“诸侯并争，原招游学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，就是当时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。这些知识分子“率其群徒，辨其谈说”（《荀子·儒效篇》），无不以到处讲学为事。在此情况下，诸子蜂起，议论纷纭，产生了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兵、农、杂、阴阳、纵横各家。因此，百家争鸣的盛况，对当时军事学术的发展同对整个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样，有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我们在讨论《六韬》的作者问题时，还应该联系《太公兵法》和“周史”来考虑问题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提到《太公兵法》一帙三卷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兵家权谋类有注：“省伊尹、太公、管子、孙卿子、鹖冠子、苏子、蒯通、陆贾、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，出《司马法》入礼也。”同是“道家类”，又有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，《谋》八十一篇，《言》七十一篇，《兵》八十五篇。这三处提到的《太公》和《太公兵法》与《六韬》是什么关系，后人

两种看法：一种意见认为两者是一回事。《庄子·徐无鬼篇》内有《金版六弢（tāo 音滔。通“韬”）》之说。唐人成玄英为之疏曰：“《金版六弢》，《周书》篇名也，或言秘讖也。本有作‘韬’字者，随字读之，云是《太公兵法》，谓文、武、虎、豹、龙、犬《六弢》也。”（见郭庆藩：《庄子集解》）。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一回事。沈涛说：“案今《六韬》乃文王、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，而此列之儒家，则非今之《六韬》也。‘六’盖‘大’字之误，《古今人表》有‘周史大弢’。古字书无‘弢’字，篇韵始有之，当为‘弢’字之误。”（《铜熨斗斋随笔》）因此，《六韬》究竟是否包括在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之内，与《太公兵法》是否同一书，尚难遽断。

再说周史其人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儒家》中所说的“周史《六弢》”，唐人颜师古注：“即今之《六韬》也，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。‘弢’字与‘韬’同也。”这里提到的“周史”其人，很可能与《六韬》有些关系。按照颜师古的说法，此人是周惠王、襄王时代的人，也可能是显王时代的人。如果真有其人，他本人或者他的先世一定当过周代的史官，因而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才有可能将他或他的先世保存下来的有关周文王、武王与太公对话的记录，加以整理而成为《六弢（韬）》的。但“周史《六弢》”，班固是列为“儒家”的。同一“志”内，“道家”又著有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，“兵家”中又提到《太公》，几种书并存而作者非一，恐怕《汉书》的编者班固也不至糊涂到如此地步。因此，也不能肯定“周史”就是《六韬》的编撰者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使我们认识到，吕望、“周史”都不可能是《六韬》的著者。真正的作者是战国后期的某人，是他

托吕望之名，将此书编撰成的，而他自己的姓名却隐匿了起来。

（二）《六韬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的作品

《六韬》的作者虽然尚难搞清，但只要大体分清它是什么时代的作品，也就不难探讨它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。对这个问题，历史上和当前学术界大体有以下四种看法：

第一、春秋说。刘歆的《七略》和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有《周史六弢》六篇。二人都认为是“惠、襄之间，或曰显王时，或曰孔子问焉”。即认为是产生于周惠王与周襄王时，也就是春秋鲁僖公、鲁文公之际，或者是鲁昭公、定公、哀公时。从历史上看，这大约是春秋晚期，最迟也不迟于战国中期。

第二、战国说。认为《六韬》成书不会在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之前。其理由是：《文韬》中的《文师》，《武韬》中的《发启》、《顺启》等篇及《逸文》中，反复出现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”的文句，似出自《吕氏春秋·贵公篇》；《龙韬·将威》中的“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，赏一人而万民悦者赏之”，似出自《尉繚子·武议篇》；《六韬逸文》中“冠虽弊礼加于首，履虽新法以践地”，似出自《韩非子·外储篇》。

第三、秦代说。认为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中圯上老人以《太公兵法》授张良，《文韬》记太公论兵，还认为张良反秦，同《六韬》反暴政是吻合的。圯上老人谓张良：“读此则为王者师”。《文韬·文师》专言王者师的治国安民之道、反暴政之道，据此认为《六韬》成书的时代背

景与秦代这段历史是契合的。

第四、秦汉之际说。宋代的罗泌在《路史发挥·论太公》中说：“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”。清代的崔述在《丰镐考信录》中也称：“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”。罗、崔二人虽没举出可靠的根据，但他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根据历代著录及出土文物，笔者基本倾向第二种看法。说得更具体点，就是认为《六韬》成书于战国后期。

首先，从历代有关著录来看。前面也已经提到，《六韬》最早的著录是《隋书·经济志·兵家》，称：“《太公六韬》五卷，梁六卷”，有注说：“周文王师姜望撰”。之后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兵家亦因之。其实，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家》虽不见有《六韬》著录，但在该志儒家中有《周史六弢》六篇。班固自注：“惠、襄之间，或曰显王时，或曰孔子问焉。”唐颜师古说：《六弢》“即今之《六韬》也。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。‘弢’字与‘韬’同也。”因此，不能只看汉志兵家没有著录就否定它在汉以前已存世了。

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情况加以印证。战国后期的庄周（约公元前369—286年）曾看过《六韬》。据《庄子·徐无鬼》记载：“横说之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纵说之则以《金版六弢》”。《经典·释文》说，司马彪、崔譔称《金版》、《六弢》皆为《周书》篇名。西汉成书的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也称：“故通许由之意，而《金滕》、《豹韬》废矣。”东汉高诱注：“《金滕》、《豹韬》，周公、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。”他毫不含糊地认为，《豹韬》为太公的作品。

《淮南子》的作者刘安，是西汉初年人，说明在他之前，

太公的著作已流行于世了。《战国策·秦策》说：“苏秦夜发陈箠数十，得太公阴符之谋，伏而诵之，简炼以为揣摩。”苏秦、张仪“俱事鬼谷先生学术”（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），因此他的这部书是得自鬼谷子的。鬼谷子是战国时人，说明在战国时，太公的著作是容易见得到的。余嘉锡在《四库辨证提要》中说：“特是《六韬》、《豹韬》之名，见于《庄子》、《淮南子》，则是战国秦汉之间本有其书，汉人仅有所附益，而非纯出于伪造。周秦诸子，类非一人之手笔，此乃古书之通例，又不独《六韬》为然。”其意在于阐明，早在战国时就有《六韬》这部书了，后人说法不同，只不过是有所“附益”罢了。所以，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。

其次，再从《六韬》的内容看。古代兵书是反映和总结其所处时代及其以前的战争实践的，它绝不会脱离或超越时代而反映尚未出现过的事物。春秋时期的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司马法》并不曾言骑战。《灵子·励士篇》始言骑战：“车五百乘，骑三千匹，而破秦军五十万。”汉刘向说：“战国有骑，无骑射。骑射，胡兵也，赵武灵王用之。”（董说：《七国考·赵兵制胡服骑射条》）《六韬》用了很多的文字谈骑兵，详细规定了选拔骑士的条件，阐述骑兵作战的战术，以及如何与步兵、车兵配合等等。赵武灵王在位的时间为公元前325至299年，由此可见，《六韬》之所以能总结出如此系统丰富的骑兵作战经验，肯定是在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之后，但又不会离此时太远。

再说车战，商周时是我国古代车战的极盛时代。春秋以后逐渐衰弱，战国秦汉时已比较少用了。特别是由于战国时期铁兵器的使用，步战地位日益重要。这就使得战国

时期，特别是战国中后期，出现了骑、步、车并用的时代。

《六韬·犬韬》详细阐述了“战车”、“战骑”、“战步”及其相互关系，正是战国后期所普遍采用的战术原则的反映。车战于战国时期开始衰弱，但真正让位给骑兵和步兵，还是秦汉以后的事。因此，《六韬》将车、骑、步并列，正说明它既不是成书于春秋之前，也不是成书于秦汉之后。

《六韬·虎韬·军用》提到“铁蒺藜”、“铁械锁”、“环利铁索”、“方胸铁把”、“方胸两枝铁叉”、“委环铁杙”、“方胸铁叉”等十来种铁制军器，说明《六韬》不可能成书于战国之前。众所周知，战国以后才进入铁兵器时代。《国语·齐语》有用铁制农具、用铜制兵器的记载：“美金以铸剑戟，试诸狗马；恶金以铸钊、夷、斤、鬲，试诸壤土”。《吴越春秋》记载有干将、莫邪两种有名的钢剑，但种类单一，只有到战国中后期，铁兵器种类才开始增多。因此，《六韬》一书大约产生于这时前后。

第三、从文风上看。大体与《六韬》同时成书的兵书及其他各家的著作很多，诸如《尉繚子》、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等，它们在思想内容、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等方面，都有很多相似之处，甚至一些语句完全相同。《龙韬·论将》有“贪而好利者，可赂也”一句，《孙臆兵法》则说“将败，四曰贪于财”，“尉繚子·十二陵”则称“祸在于好利”。又如《龙韬·立将》中有“若此，则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无敌于前，无君于后。”《尉繚子·武议篇》称为“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无主于后，无敌于前。”《淮南子·兵略篇》也有类似的语句。《六韬》中的《文师》、《发启》、《顺启》等篇及《逸文》中，多次出现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”的句子，而

《吕氏春秋·贵公篇》也说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之天下也。”《龙韬·将威》说：“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，赏一人而万民悦者赏之。杀贵大，赏贵小。杀及当路贵重之臣，是刑上极也；赏及牛竖、马洗、厮养之徒，是赏下通也。刑上极，赏下通，是将威之所引也。”而《尉繚子·武议篇》也有同样的记述。《龙韬·军势》说：“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。”而《吴子·治兵篇》则说：“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生于狐疑。”这些例子，虽然难以断定谁先谁后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《六韬》一书大致与这些书出于同一时代，而不是相距很远。

第四、从所反映的当时的军事情况来看。《六韬》所反映的军事情况，在不少方面与其他同时代书籍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。例如，《犬韬·教战》中说：“故教吏士：使一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十人。十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百人。百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千人。千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万人。万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三军之众。大战之法，教成，合之百万之众。”《尉繚子·勒卒令篇》所说与《六韬》基本相同，它说：“百人而教战，教成，合之千人；千人教成，合之万人；万人教成，合之于三军。三军之众，有分有合，为大战之法。”当时军队的训练情况，在两本书中得到大体一致的反映，说明成书的时代也是大体相同的。再如，关于阴阳五行说，自战国以后开始运用到军事学术领域。同《六韬》一样，在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墨子》等书中，都有大体一致的反映。《龙韬·五音》中提到：“五行之神，道之常也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各以其胜攻也。”《孙臆兵法·奇正》中则说：“有胜有不胜，五行是也。”

第五，从出土文物资料来看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出土的汉人手书竹简中，有《六韬》及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等书。其中有关《六韬》的竹简有《文韬》、《武韬》、《龙韬》等内容，与传世本《六韬》基本相同（见许获：《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》，《文物》1974年第2期）。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，也有《六韬》的内容。这两处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文献，充分证明了《六韬》早在西汉初期已有定本，并已广泛流传。

总之，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都可以证明，《六韬》是战国后期的作品。

（三）《六韬》及《六韬逸文》的版本

《六韬》的版本很多，不完全统计约有二十多种存本。最主要的有宋朝元丰二年何去非校定的《武经七书》本，宋元丰间朱服校刊《武经七书》本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涵芬楼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宋刊《武经七书》本，明嘉靖十年施德刊《校正武经七书》本，明嘉靖三十二年翁氏刊《武学经传三种》本，明嘉靖四十年临海陈锡刊《武经七书》本，清乾隆间《四库全书》抄本，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抄本和扫叶山房石印《百子全书》本，民国二十五年缩印本，清光绪间刊《武经三子全书》本，等等。

本书在译说时以影宋本为底本。为什么以宋本为底本呢？因为今日所能见到的《六韬》存本，有不少已经失去

了其原来的面貌。用今存本《六韬》与《群书治要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中有关《六韬》的内容稍加核对，就可看出二者的内容有许多处是不同的。这说明今存本《六韬》已经不是汉、隋、唐各志所著录的《六韬》了，而是宋元丰间所改的定本。既然找不到宋以前的本子，又没法肯定《群书治要》本的可靠性，那就只好选用宋本了。

本书作者既然决定选用宋本为底本，那就有必要把宋本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介绍。宋仁宗时，始建武学，设武举。神宗时，专门选拔熟谙兵法的教授，把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六韬》作为教授和考试的内容。熙宁八年（公元1075年），又以《六韬》不完整而被废去。到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，神宗下诏校定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，并刊行，这就是所谓《武经七书》。校定者为何去非，他是我国第一位武学博士。他确实学识渊博，精通兵法。据其子何藹在《春渚纪闻》中记载，其父任武学博士并受命校正《武经七书》时，曾怀疑《六韬》和《李卫公问对》是否伪托，并将此事报告任国子监司业的朱服。朱服表示：“此书行之已久，未易遽废也。”从此以后，这七部兵书便按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的顺序固定了下来。今存影宋刊本《武经七书》，就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。

南宋孝宗时刊行的《武经七书》，又把《六韬》由第七位移到第四位。光宗时刊行的本子又把《六韬》提前到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之前，即第一位。明代刘寅作《武经七书直解》时，又恢复了朱服校定的次序，使《六韬》居尾。《六韬》在《武经七书》中前后位置的变

化过程，正反映出它成书时间没有定论的实际状况，但这对它的学术价值并不构成大的影响。

关于《六韬逸文》，有清嘉庆十年（公元1805年）孙同元的《六韬逸文》一卷（附《周书六韬》内），辑自《礼记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所注汉、唐、宋各代类书。今存清嘉庆十年刊本，咸丰五年长恩书室重刊《平津馆丛书》本，光绪十一年吴县朱氏槐庐家塾重刊《平津馆丛书》本；1911年王仁俊的《六韬佚文》一卷（在《经籍佚文》内），只在《书目丛录》内有著录，未见存本。此外，还有孙星衍、黄奭所辑的《六韬逸文》。本书只收孙同元的《六韬逸文》，附于书后，以供读者参考。此外，尚存有光绪五年（公元1879年）汪宗沂辑的《太公兵法逸文》一卷，前有《太公兵法逸文序》一篇，因篇幅所限，也不再附录。

《六韬》在国外有很大影响。十六世纪时开始译成外文，在外国出版。日本是《六韬》传入最早的国家，刊本也最多。庆长十一年（公元1600年），有元佶的《校定训点六韬》六卷出版。该书以《七书讲义》本，校《武经七书直解》本，删去《讲义》、《直解》，只存正文，并加假名训点，存庆长十一年刊伏见古活字本、万治二年野田弥兵卫重刊活字本。后又有万治二年（公元1659年）林道春的《六韬训点》一卷，延宝三年（公元1675年）山鹿高祐的《六韬要证》一卷，文化五年（公元1808年）关重秀的《六韬正义》一卷，等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公元1600年至1976年，日本共有《六韬》译、注、解、评、点近四十种。此外，《六韬》还传入朝鲜、越南等国，并译成朝鲜、越南文刊行。这些国家对《六韬》有很高的评价。例如，日本村山孚先生在其译著的《中国的思想·六韬》（1976

年东京德间书店出版)第十卷中称:“姜太公是伟大的战略家”,《六韬》虽然“没有《孙子》那种独创性,也没有《尉缭子》那种一贯性,但在当时的实战中,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。”北村佳逸在所著《兵法六韬》(1936年东京立命馆出版)中说:“《六韬》的原理以天的规律(天理)为其理论依据,因而使该书具有三千年的生命力,而至今不丧失其朝气蓬勃的生机。”还认为《六韬》在战略战术上有许多特点,例如,“善于采取战略攻势”,“重视战争初期的活动”,“善于等待战机成熟之后,再突然给敌以正面打击”等观点,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。